

## 怎样读经典

与《中华读书报》合办

# 怎样读《中庸》

— 1 —

《中庸》是儒家重要经典，涵盖面广，是宋以后儒者研读的重点。儒学，特别是理学，许多概念、命题出自《中庸》，许多理学大家持守《中庸》的信条，许多儒者用《中庸》的方法论思考，从而可以看出，《中庸》对中华文明的形成有着深远的影响。

但今本《中庸》，并非独立成编。它仅是《礼记》中的一篇，初始既没有引起人们广泛关注，也没有留下作者姓名。

对于《中庸》的作者，一般认为，它出于子思（前483—前402）之手。司马迁曾说子思作《中庸》。至宋代，理学家也认为《中庸》为子思所作，这几乎成了定论。近代人们对《中庸》作者产生疑问，认为《中庸》是秦代作品，也有人认为是子思所作，只是掺入了秦人文字。我觉得现存存的《中庸》，还应为子思所作，但可能经过秦代儒者的修改写定。

现存本虽说没有独立成编，但早在西汉时代就有专门解释《中庸》的著作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著录有《中庸说》二篇，以后各代有关这方面的著作也有一些，但影响甚微。唐代韩愈注意《大学》《中庸》，揭示道统。到宋代，很多人目光转向《中庸》，范仲淹让理学开山者之一张载读《中庸》，二程表彰《中庸》，二程弟子也有关于《中庸》的著作，朱熹讲友石子重作《中庸解》，但影响最大的还是理学集大成者朱熹的《中庸章句》。

朱熹把《中庸》《大学》《论语》《孟子》合在一起，称为“四书”，并为之作章句集注。从元代开始，《四书章句集注》成为各级学校的必读书，成为士子求取功名利禄的阶梯，影响达700年之久。

## 二

我们读《中庸》，不能只读《礼记》里的《中庸》篇，还是要读朱熹的《中庸章句》。

朱熹说，自己早年对《中庸》有很多疑问，经过“沉潜反复”，多年思考，才得其要领，最后“会众说而折其中”，才作成《中庸章句》。《中庸章句》使《中庸》之旨，支分节解、脉

## 三

## 论道

# 怎样读《中庸》

《大学》对“修身”这样论述：“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。其本乱而未治者，否矣。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，未之有也。”可见，一切事业的成功“皆以修身为本”。基于“家国同构”的理念，中国古代士人均以“修身”为第一要务。修身是“齐家治国平天下”最理想的人格基础。自身不修，不足以成家、为国、为天下。中国古代践履这一理念的士大夫不在少数，曾国藩可算是其中出类拔萃者。

历史上对曾国藩的评价褒贬不一，但对他的修身“实学”一直被后世推崇，甚至评价他为“修身齐家治国之完人”和“中国传统文人格精神的典范式人物”。回眸文献资料，年轻时的曾国藩也是“凡人”，智商不高，气量不大，生活中还有很多恶习，他自己骂自己“禽兽不如”，但他通过“师徒夹持”，以唐镜海为老师，倭良峰、婁兰泉等为朋友，立志修身，对自己高标准、严要求，通过自我反省，自我总结，成全自己。曾国藩家书中对家人谆谆教诲的修身实操指导，以及在日记中和同事进行修身心得的分享，初步形成了他独具特色的修身“实学”理论体系。

理学自宋朝以后，一直被奉为官学，其兴起和发展都与湖湘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。出生于晚清的曾国藩，自发蒙开始，就耳濡目染理学家的著述，特别在涟滨书院和岳麓书院期间，深受程朱一系语境中理学传统的熏陶。其中，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颜元提倡“实学”，注重实践的观点，因其“经世致用”之功效而引起曾国藩等湖湘理学经世派的重视。尽管明清之前的经书典籍中已有关于“实学”的记载，然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真正论

理学的许多概念、命题出自《中庸》，许多理学大家持守《中庸》的信条，

用《中庸》的方法论思考，可见《中庸》对中华文明有着深远的影响。

## 一

# 怎样读《中庸》

— 1 —

络贯通、详略相因、巨细毕举。此外还对论释《中庸》的各家同异得失，也加以辨析。他还把石子厚之书作了删节，更名《中庸辑略》，还写了《中庸或问》，以设问形式，回答有关中庸与注解的种种问题，又在讲学中，同弟子反复讨论《中庸》，这些讨论大部分收录在《朱子语类》中。可以看出，朱熹对《中庸》下了很多功夫，《中庸章句》是他的得意之作。以上这些书，是彼此密不可分的一个整体，相辅相成，是研究《中庸》不可或缺的资料。

在《中庸章句》篇题之下，朱熹对“中庸”下了一个定义，指出：“中者，不偏不倚、无过不及之名。庸，平常也。”“不偏不倚”，出自本书《立而不依》和改用《尚书·洪范》“无偏无陂”；“无过不及”，出自《论语·先进》。又用“平常”释“庸”，借以指出中庸的合度性，日用性。是“放之则弥六合，卷之则退藏于密”的道理，都是实用的学问。

《中庸》及《中庸章句》及朱熹有关著作，还讨论了儒学和理学的一系列问题，如天命、性、教、道、慎独，情，已发未发、中和、大本，达道、在中、时中、用中、费隐、忠恕、鬼神、五达道、三达德、知行、治国九经、择善固执、诚、致曲、尊德性而道问学、学问思辨行、三重、仁义礼智、无声无臭，等等，有天道，有人道，有本体，有工夫。许多儒者对这些概念和命题也倾注了极大的热情，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论辩。这些讨论，虽说常常莫衷一是，但丰富多彩，细致入微，富有哲理。可以说宋明理学所以能成为本体化、哲学化的思潮，达到了时代哲学高峰，是和《中庸》及《中庸章句》密不可分的。

《中庸》在儒家典籍中，是高层次的理论色彩浓厚的著作。读通、读懂很不容易。

为帮助读者读懂《中庸》，下面具体对各重点章节做一个简单介绍。

# 怎样读《中庸》

# 修身之实学

— 1 —

释和践行其内涵者，应为“晚清第一名臣”曾国藩。因为纵观曾国藩一生，他始终将“实学”的意蕴贯彻到其理学实践中，且将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发挥至极致。

## 实用：修德读书，国之藩篱

读书以明理是曾国藩修身“实学”的重要方法。钱穆认为：述说近百年之诸儒读书论，曾氏是极可注意的第一人。明清时期，读书人往往把“赢得生前身后名”作为自己求学的终极目标，在年轻的曾国藩看来，读书不应只是求取功名的手段，而应将“修身、明理”摆在首位，他告诫家里的年轻子女：“凡人一家，只有‘修德读书’四字可靠”，愿为“读书明理之君子”。他把那种读书不修身的人斥为“识字之牧猪奴”。他认为，人的气质本来是天生的，本来难以改变，但读书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情操和价值观，这种观点与苏轼在《和董传留别》中“腹有诗书气自华，最是书香能致远”有着异曲同工之妙。

读书以远志是曾国藩修身“实学”的重要途径。他从二十三岁进入岳麓书院开始，终其一生，“无一日不读书，无一日不作文”，不论是初出茅庐还是名满天下，身处顺境还是逆境，健康或者疾病，青壮年还是迟暮之年，他都坚持以读书修身，以史为鉴，以书为鉴，以“国之藩篱”目标，通过自我道德修炼，达到圣贤的道德境界。道光二十二年（1842年），三十一岁的曾国藩读书后感悟到：“每日所看之书，句句皆物；切己体察、穷究其理即格物。所谓诚意者，即其所知而力行之，知一句便行一句。坚持二者并进，则便会达到下

者，实此篇之枢纽也。”（《四书集注》）

第二十一章是继续讲诚。这里接上章讲“诚”。“诚”就是真实无妄。从诚开始，便具有善，这是先天的性，和圣人对应。而一般人先明乎善，真实无妄，这是后天教育的结果。无论是天性还是后天者为的教育，只要做到了真诚，二者也就合一了。朱熹说：“右第二十一章。子思承上章夫子天道、人道之意而立言也。自此以下十二章，皆子思之言，以反复推明此章之意。”这个总结是正确的。

第二十二章是讲至诚和性关系及其价值，也是讲圣人与天道关系。

第二十三章是讲善德积累和诚的关系。上章谈的是圣人，本章说的是一般的人。

第二十四章是讲至诚的作用和天道相联。东阳许氏曰：“至诚前知，亦必于动处见所谓‘几者，动之微’，吉凶之先见者也。圣人知来者如此，非有异也，故为中庸。”（《四书大全·中庸章句大全》）心诚则灵。灵到能预知未来吉凶祸福的程度，这似乎有些夸大，有点神秘。其实，无非是强调真诚见微知著的出神入化的功用罢了。

第二十五章是讲要用诚来成己成物，讲的是人道。真实，从自然的方面来说，是事物的根本规律，是事物的发端和归宿；真诚是从人的方面来说，是自我的内心完善。所以，要修养真诚就必须做到物我同一起来实现。这叫“合内外之道”。

第二十六章这里用天地之道，形容至诚的盛美与生生不息。前面历数历代圣人，这里把圣人之道作了一个总结。

第二十七章，首先盛赞圣人之道像天一样广博浩瀚，大概是从《易经》中“天地大德曰生”而来。君子应该做到“尊德性而道问学”五句。朱熹认为，“尊德性而道问学”五句，“大小相资，首尾相应”，最得圣贤精神。

第二十八章，前面谈了智、仁、勇、孝等道德规范，这里是讲礼乐问题。本章承接上一章发挥“为下不倍”的意思。谈的还是素位而行的问题。

第二十九章这是讲君子之道要经过各方面验证，才能成为天下法则。

# 修身之实学

— 1 —

学便上达的目的，才能始于修身，格物致知、诚心正意，而终于治世，获得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的功效。”之后，他把读书修身与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紧密联系起来，在日记中写下“读书立志，须以夙勉立功，志大人之学”以自勉，同时谆谆告诫家人亲友读书要志存高远，要有远大理想，要有内圣外王的抱负。

## 实诚：拙诚修身，脚踏实地

拙诚修身是曾国藩修身“实学”的最大特征。“拙诚”一词出自《韩非子》：“巧诈不如拙诚。”“拙诚”是指心中不存恶念，诚心诚意地做事，虽然有时行为举止略显愚蠢直拙笨，但从不欺瞒别人。曾国藩五岁启蒙，六岁人家塾“利见斋”，在父亲的指导下，学习非常扎实，并发展出了一套践行“拙诚”理念的功夫，强调做任何事不存投机取巧之心，一步一步、实心实意。例如，他讲究扎硬寨打呆仗，步步为营，同时诚心诚意地关怀体恤部下，训诫部下时从不空谈大道理，凡事尽量亲力亲为，特别是识人用人必须亲自考察了解，细致观察他人的日常行为举止。他为树立勤政实干的官场正气，亲自编撰《劝诫浅语十六》，强调实干苦干，要求官员勤勉务实，并以此作为自我的行为准则。他从治事到治军，都践行拙诚理念，直到垂暮之年。

笃实践履是曾国藩修身“实学”的最大特技。青年曾国藩深受湖湘鉴师的熏陶，注重经世致用，同时借鉴老师友关于修身的观点，牢记鉴师的教诲，在逆境中接受磨炼，“必以践履为主，不徒讲习讨论而可云学也”。他在修身“行之以实，持之以久”，“但

者，实此篇之枢纽也。”（《四书集注》）

第二十一章是继续讲诚。这里接上章讲“诚”。“诚”就是真实无妄。从诚开始，便具有善，这是先天的性，和圣人对应。而一般人先明乎善，真实无妄，这是后天教育的结果。无论是天性还是后天者为的教育，只要做到了真诚，二者也就合一了。朱熹说：“右第二十一章。子思承上章夫子天道、人道之意而立言也。自此以下十二章，皆子思之言，以反复推明此章之意。”这个总结是正确的。

第二十二章是讲至诚和性关系及其价值，也是讲圣人与天道关系。

第二十三章是讲善德积累和诚的关系。上章谈的是圣人，本章说的是一般的人。

第二十四章是讲至诚的作用和天道相联。东阳许氏曰：“至诚前知，亦必于动处见所谓‘几者，动之微’，吉凶之先见者也。圣人知来者如此，非有异也，故为中庸。”（《四书大全·中庸章句大全》）心诚则灵。灵到能预知未来吉凶祸福的程度，这似乎有些夸大，有点神秘。其实，无非是强调真诚见微知著的出神入化的功用罢了。

第二十五章是讲要用诚来成己成物，讲的是人道。真实，从自然的方面来说，是事物的根本规律，是事物的发端和归宿；真诚是从人的方面来说，是自我的内心完善。所以，要修养真诚就必须做到物我同一起来实现。这叫“合内外之道”。

第二十六章这里用天地之道，形容至诚的盛美与生生不息。前面历数历代圣人，这里把圣人之道作了一个总结。

第二十七章，首先盛赞圣人之道像天一样广博浩瀚，大概是从《易经》中“天地大德曰生”而来。君子应该做到“尊德性而道问学”五句。朱熹认为，“尊德性而道问学”五句，“大小相资，首尾相应”，最得圣贤精神。

第二十八章，前面谈了智、仁、勇、孝等道德规范，这里是讲礼乐问题。本章承接上一章发挥“为下不倍”的意思。谈的还是素位而行的问题。

第二十九章这是讲君子之道要经过各方面验证，才能成为天下法则。

## 一

官至总督时，仍穿家人为他纺织的粗布衣和自制的鞋袜，一件青缎马褂，只有在大典迎宾待客时才会穿上，此件马褂跟随他30多年。他还要求家人衣物不得多制，不准用丝绸，不能过多装饰……他明确表示，自己出行无需迎來送往，生活开支上能省则省。他饮食简单，早餐吃开水泡饭，每顿饭以一荤菜为主，“绝不多设”。在南京城任两江总督府内时，晚上批阅公文时的灯光也不浪费，家里的女眷要就着灯光纺纱织麻。

淡名利利是曾国藩修身“实学”的重要表现。他在岳麓书院读书时就与人“争光”，宁愿自己吃亏。后来进入官场，时局错杂，但他在入世中出世，超脱人世间的名利纷争，在人生成就的巅峰，解散湘军，为国效忠。他告诫子女“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，余不愿为大官，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。”名利皆因贪欲起，他希望子女不可贪图富贵奢华，“勤俭自持，习劳习苦，可以处乐，可以处约，此君子也。……尔年尚幼，切不可贪爱奢华，不可惯习懒惰。无论大家小家、士农工商，勤苦俭约，未有不兴，骄奢倦怠，未有不败。”据史料记载，清代官员薪禄不高，年轻的曾国藩为人慷慨，为政清廉，他三十至四十岁为官期间，个人财务基本每年都出现赤字，日子过得窘迫。在他统军之后，掌握军中财政大权，可以支配的钱财很多，但他并未中饱私囊，仍表示“不要钱”甚至把自己的部分收入捐赠给战区灾民。曾国藩的女儿曾纪芬80岁时回忆父亲说，父亲的部下都了解他的人格，都能廉洁自律，淡泊名利，也从来没有部下给他送礼。正是由于他的勤俭清廉，淡名轻利，远离贪欲，得了人心，得到了部下的追随。



子思像

这一章承接“居上不骄”的意思而发挥。

第三十章这是赞美孔子，提出万物并育而不相害，道并行而不相悖命题。“祖述尧舜，宪章文武”这两句话，成了道统论的雏形，屡被后儒所称道。用“万物并育”，“道并行”比喻孔子的博大宽容，用“小德川流，大德敦化”来形容万物的多样性与统一性。

第三十一章极言至圣之德，含有仁义礼智。朱熹说：“聪明睿知，生知之质。临，谓居上而临下也。其下四者，乃仁义礼知之德。”（《四书集注》）显然是对的。

第三十二章是讲至圣诚仁作用，是中庸释义“不依”的依据。此章还是讲“至圣”。至圣必须是至诚的。“大经”，指五伦一五种人际关系；“大本”，指性之全体，如仁等，“大经”“大本”立起来了，崇高的道德自然会独自挺立，无须依托任何东西。全篇极力形容至圣和道的同一。

第三十三章引用《诗经》证明君子之道的特点及治世作用。此篇由前面圣人之道的高远广博，回归于君子之道。使人联想前面的“君子之道，譬如行远必自迩，譬如登高必自卑”的人德之路。

综上，我们可以得出几点结论性意见。一，《中庸》思想来源主要是孔子思想。二，朱熹正确地解释了《中庸》的结构与章节之间的关联。三，《中庸》的展开是从天道开始，逐步进入人道的具体体内函，最后谈的是德教的力量与方法。四，《中庸》主要讨论的是天道与人道关系。是“究天人之际”的名篇。五，提出了独特的方法论。这些需要阅读时慢慢体会。

（作者系中华书局编审、著名古籍整理和哲学史研究学者）

纵 横

## 房彦谦的清白父爱

# 房彦谦的清白父爱

— 1 —

公元579年生于齐州临淄（今山东章丘）的房玄龄，是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宰相，任宰相32年，一生充满传奇，被称为唐朝“开国贤相”，可谓名满天下，妇孺皆知。

广大读者提起房玄龄，往往对他如何运筹帷幄、清正廉洁、一生谨慎及他“醋坛子”老婆、“駙马爷”儿子等津津乐道，房彦谦15岁过继给叔叔房子贞，房彦谦自幼丧父，哥哥房彦询觉得弟弟“天性聪颖有悟性”，便教他读书写字，以致房彦谦七岁就“诵数万言”，亲戚朋友都认为这孩子很奇怪；房彦谦15岁过继给叔叔房子贞，侍奉继母超过亲生母亲，后为继母守丧5天不进食；“遇期功之戚，必蔬食终礼，宗从取则焉。”这话的意思是，遇到亲戚的丧期，必定以粗米、草菜为食，尽到礼节，宗族中的人都以他为榜样。

由此可见，房玄龄的父亲，这个从小就没爹孩子，未成年就以学习成绩和坚守孝道闻名乡里，并在家族中脱颖而出。房彦谦18岁时时任齐州刺史的广宁王李暉做主簿，初入仕途就在官场法律松驰、“州郡之职尤多弛弛”的环境中，但他能“清简守法”，令同行肃然起敬。开皇七年（587年），房彦谦因政绩突出被提升承奉郎、监察御史。任秦州总管录事参军时，深受左仆射（宰相）高颖嘉许，以致于高颖对全国各州总管、刺史说，与你们谈话，不如单独跟房彦谦聊。

公元602年，房彦谦从秦州调任长葛县令，因勤政廉洁、一心为民，深受百姓爱戴，被老百姓称为“慈父”，其德、能、勤、绩综合考核为天下第一。朝廷提拔他任都州司马时，长葛县的官吏百姓号啕大哭：“房明府今去，吾属何用生为！”老百姓还给他立碑颂德。连一代文宗、内史侍郎（副宰相）薛道衡和隋门侍郎张衡对他也“深加友敬”。贞观末年，烽烟四起、军阀混战，朝臣们大多改变节操。但房彦谦却“坚守正道，有如平常”。

人们的潜意识里，母亲是无条件呵护、滋养、抚慰、教育儿女成长的人。但《隋书》《北史》及《资治通鉴》提到房玄龄的成长，皆称房彦谦“教子有方”。房彦谦本是“家有旧业、资产素殷”的“富二代”，加上做官所得俸禄，总不致于经常囊中羞涩吧，但房彦谦“皆以周恤亲友，家无余财，车服器用，务存素俭”；从少年到成年，他的一言一行，从不涉及私人的事；虽生活拮据，却怡然自得。他曾告诉儿子房玄龄：“别人都因当官的俸禄发财，我却独因做官而贫困。所留给子孙的，只有清白啊！”

的确，房彦谦写的文章，气派宏大，风格典雅；他还擅长隶书，如果有人能得到他的书信，都视若珍宝悉心收藏。但他从不把文章和书法变卖；他家入不敷出，却常常高朋云集、冠盖相望，但他始终坚持谨慎交友，所处朋友都为一时著名的高雅清俊人物，没有一个品德低下、行为劣劣的，“有识者咸以远大许之”。

可见，房彦谦虽没给儿子留下巨额家产、向上爬的“梯子”等，但他清白做人、清白做官、清白交友、清白持家等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儿子房玄龄。父亲的德行是子女最好的遗产。房彦谦对子女的“清白”之爱，何尝不是留给房玄龄等子女最珍贵的遗产。

房彦谦过世后，李百药为其撰碑文，称其：以风素自居，清虚味道，沈冥寡欲，恭敬以揖节，退让以明礼。潜隐之操，始擅于州间；高亮之风，日闻于海内。于是群公仰德，邦君致礼。

